

季平子 著

从鸦片战争 到甲午战争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从 鸦片战争 到 甲午战争

——1839年至1895年间的中国对外关系史

季平子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陈丽菲

封面设计 黄惠敏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

——1839年至1895年间的中国对外关系史

李平子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 邮政编码20006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昆山亭林印刷总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0.75 插页:2 字数:480千字

1998年3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1—2000本

ISBN 7-5617-1750-4/K·149

定价:29.00元

目 录

第一章 背景——嘉道年间的中外关系	(1)
第一节 中国的自我满足状态和西洋、俄罗斯、日本的 扩张精神	(1)
第二节 中俄关系和俄、日分占库页岛	(39)
第三节 中英关系	(46)
第四节 中西贸易和耶稣教士东来	(69)
第五节 英人完成军事进攻的准备 中国力图禁绝鸦片	(87)
第二章 鸦片战争	(115)
第一节 林则徐和义律在广东的斗争	(115)
第二节 英军占舟山 到大沽行使离间计而无力发动 进攻	(131)
第三节 琦善和奕山在广东与义律的议和与战斗	(147)
第四节 璞鼎查的进攻	(172)
第五节 中英《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 美、法两国接 踵来华订约	(193)
第三章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	(217)
第一节 西洋人在中国沿海	(217)

第二节	英人在广州和上海的战争行为以及英、法、美的领土野心.....	(229)
第三节	俄罗斯武装侵占大片中国领土.....	(244)
第四节	清政府祈求长期和平 英政府图谋发动新的战争.....	(250)
第五节	太平军起义初期俄、英、美、法四国扩大对华侵略.....	(265)
第四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	(293)
第一节	从英、法策划侵华战争到天津订约	(293)
第二节	中英上海谈判和英、俄、法、美四国的进一步侵略活动.....	(320)
第三节	从第二次大沽战役到英、法、俄三国《北京条约》.....	(336)
第四节	第二次鸦片战争所订诸约.....	(357)
第五章	自强新政期间(1860—1894 年)的对外关系(上)	(367)
第一节	同治年间的清政府及其与列强外交关系的建立.....	(367)
第二节	同治年间俄、英、法、美四国的侵略活动	(380)
第三节	通商、传教、修约.....	(415)
第四节	收复新疆和筹议海防.....	(441)
第六章	自强新政期间(1860—1894 年)的对外关系(下)	(467)
第一节	光绪前期的清政府及其海军建设.....	(467)
第二节	收回伊犁和中俄战争危机.....	(475)
第三节	中法战争.....	(489)
第四节	中国人开始认识西洋和西洋人东来以后的国	

第一章 背景——嘉道年间的中外关系

第一节 中国的自我满足状态和西洋^①、 俄罗斯、日本的扩张精神

【嘉道年间——近代中国的序幕】 这里“嘉道年间”一词并不是指嘉庆年号(1796—1820年)和道光年号(1821—1850年)的全部55年,而是指从马戛尔尼(Lord Macartney)来华和清廷大规模搜捕白莲教徒的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到鸦片战争爆发的道光十九年(1839年)期间的47年。它包括乾隆年号最后3年,嘉庆年号全部25年,和道光年号的前19年。处于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之交的这47年,自成一个小段落,无以名之,名之曰“嘉道年间”。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十一月,廓尔喀兴兵入藏。大掠后藏首府札什伦布,并屯兵不去。乾隆帝遣福康安率兵入藏,于次年四月逐廓尔喀兵出西藏。六月,福康安追击入廓尔喀。八月,廓尔喀请和。乾隆帝在热河得报,谕令福康安即行撤兵回京,许廓尔喀称臣纳贡。事后,乾隆帝写了一篇文章,自夸他在位时十次用兵的功绩,题为《十全记》^②,自号“十全老人”。这年乾隆帝已82岁了,他之所以写这篇文章,并以《十全记》为题,说明他自

度这次用兵是他最后一次“武功”了。但是，乾隆帝恐怕没有意识到这次用兵也是整个清朝历史上的最后一次“武功”。清朝已由盛转衰，第二年，即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出现了两个不祥之兆，一是清朝政府下令大规模搜捕白莲教徒，宣告了清帝国衰败、破裂时代的来临。二是英使马戛尔尼来华，预示此后中国将受到新的侵略势力的入侵。这新的侵略势力和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所曾遇到的外来入侵势力都不相同，它引起此后中国在各方面所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就以这两个不祥之兆作为这个历史小段落的开始。从这一年开始到鸦片战争爆发，这古老中国渡过的最后约半个世纪的时间，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的序幕。

【中国以“天朝”自居，嘉道年间清朝开始衰落】 旧中国以“天朝”自居，自视为世界上唯一的文明社会，而视中国以外的人都是蛮夷^③，称之为“四夷”。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中国人放弃了这观念，知道那是不符合事实的偏见。但是，很多中国人迄今还不知道，这一偏见并非中国人所独有，地球上所有进入文明社会的人都曾抱有过同一偏见，西洋人也不例外^④。

这一偏见虽为所有进入文明社会的人所共同持有，但各文明社会的人却在这一点上各具不同的特点；他们对于被其视为蛮夷的人所采取的也是极不相同的态度和政策。

中国的特点之一是：自从秦朝以来，两千年间，中国以统一在一个朝廷之下为常态，分裂则为不正常状态。

中国的特殊的对待“四夷”的态度和政策体现出中国的特点之二是：不要求扩张。《汉书·匈奴传》对中国对待“四夷”的态度和政策作了一个概括的叙述：“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

让，羈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⑤何休用更简单扼要的语句表达同一个意思：“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⑥中国天子自以为是天下“唯一”的最高统治者，这个天下“唯一”的最高统治者只要统治天下“唯一”的文明地区中国。当中国分裂时，他要把它统一起来。既统一了中国，他认为中国以外，“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这就是说，中国以外的地方既没有必要，也是不可能去统治的。汉、唐、清等朝在强盛时期曾多次派遣大军出征，但那些征伐都是对外来威胁的反应，属于“来则惩而御之”性质，目的在于“和”和“守其故有”，并非扩张要求的表现，和西洋国家、俄罗斯、日本为扩张要求而发动的侵略战争具有不同的性质。客观的历史学家在较深入的、全面的了解中国史上那些征伐以后说：“扩张于长城以外的最庞大的征伐也带有防御性质。”^⑦“天朝”甚至对边境土地也抱着“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⑧的态度。中国以外的“四夷”，凡“慕义而贡献”者，一律“来者不拒”，与之建立朝贡关系。其余“蛮夷”则“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即“去者不追”，也就是不与之建立关系。

什么是朝贡关系？如果我们不求甚解地读历史，很可能把“天朝”与朝贡国的关系和近现代列强与它们的殖民地、保护国的关系混为一谈。其实两者是绝对不同的。“天朝”与朝贡国，“接之以礼让”，换言之：“从古驭小之道，一统无外，则当怀之以德。”^⑨所谓“接以礼让”或“怀之以德”的办法是：对其贡献，按“厚往薄来”原则，给予较所贡献远为优厚的赏赐；对其国人（也包括没有朝贡关系国家的人）之来华者，按“一视同仁”的原则^⑩，不加歧视。这种国际关系是按“礼”和“德”的原则建立和维持的。“天朝”对朝贡国，政治上不加统治，外交上不加过问，军事上不加控制，经济上不加搜刮或剥削。而列强对殖民地则是政治

上派总督统治,军事上加以占领,经济上榨取其财富。对于“保护国”或“附属国”,虽保留其国王或酋长作为傀儡,但也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各方面都加以控制,列强的保护国或附属国关系实为殖民地统治方式之一种而已。

朝贡国之对于“天朝”中国,有的是“慕义”而来的,有的则不是。“岛夷朝贡,不过利于互市、赐予,岂真慕义而来?”^①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朝贡国决不是慑于“天朝”的武力而来的。这可以从 1662—1761 年(康熙元年至乾隆二十六年)清朝强盛的 100 年中,中国接待贡使 216 次,而 1762—1861 年(乾隆二十七年至咸丰十一年)清朝衰落的 100 年中,却接待贡使 255 次^②的历史事实中得到有力的佐证。

中国历朝对待“四夷”都采取同一态度和政策,只有那个不接受中国传统的元朝是例外。清朝也是一个少数民族掌权的朝代,但这个朝代按中国传统办事。乾隆帝在他的《十全记》中,又一次重申这一传统政策:“我武既扬,必期扫穴犁庭,不遗一介,亦非体上天好生之意,即使尽得其地,而西藏边外又数千里之遥,所谓不可耕而守者,亦将付之他人。”^③

人们只有理解中国的“天朝”观念和“天朝”对“四夷”的态度和政策,才能读得懂清政府的外交文件^④,才能理解清政府为什么以不合时宜的态度和政策对待西洋人和俄人。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放弃了“天朝”观念,也是因为看得出那种态度和办法是错误的,或者是极不恰当的了。

中国的特点之三是:中国人“具有传统的和平特性”。这一点,西洋人和俄人在来到中国之初就都看出来了。天主教奥斯丁会修士拉达(de Rade)于 1569 年说:“中国人毫不勇武”,“中国人具有传统的和平特性”。^⑤爱好和平并非坏事,但爱好和平而缺乏武力、不能保护自己,会构成西洋人和俄人对自己进行侵略

的引诱。有人就曾指出：“虽然在《北京条约》订立以前，斋桑湖始终在中国版图内，但是（在 18 世纪）我国（指俄国）西伯利亚的哥萨克人利用中国人的爱好和平，自由地在斋桑湖上和黑额尔齐斯河上捕鱼。”^⑩到了 20 世纪，西洋人对中国的理解更深了，对中国人爱好和平的特性看得更为透澈。英人季南（N. G. Kiernan）说：“他们（指西洋人）对自己的艺术、宗教、科学中所散布的尚武精神习以为常，从而罕能理解这个安于和平、不爱战争的国家（指中国）之存在。其实，军事上的软弱并非旧中国政治上的偶然现象，而是它的主要构成部分……中国的气氛纯然是反战的。……固然它有过多次数爱国的自卫战争，但是这些战争并非那些深深印入现代欧洲人脑际的连续危机。随着不时爆发的变乱而俱来的屠杀，使它厌恶了流血。”^⑪中国人认为“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除元朝以外，历朝的文臣、武将、皇帝都重复这么说。这是他们的座右铭，“天朝”政府的一贯政策。

中国的特点之四是：中国人不求了解外情。中国人既认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去统治中国以外的地方，也就不重视对外国情况的了解。其实，既与外人有接触，为了自身的安全，就应该从事外情的了解，“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班固就认为应该“通知外国事”，即使没有战争，在和平往来时期也完全应该了解对方。班固这话实包含有“天朝”上国对落后的“四夷”也应该有所了解的意思。可惜，像班固这一类人的思想并没有能影响传统的对外国策，一种自我满足的情绪，导致中国人对外部世界始终处于淡漠而无知的状况^⑫。中国史书对于当时已知的外国只有简略的记载，有的国家甚至简略到只有三言两语的地步。中国人在西洋人、俄人东来后，以为他们“也是与以前的夷狄一样的夷狄，称他们为夷。因此中国人并不感到多大不安，即使在交战中吃了败仗也是如此”^⑬。因而既对他们东来后中国所处的新的国际环境无

知,也不知吸收他们的长处。面对西洋人、俄人的侵略,中国人感到束手无策。

中国人岂但没有主动去了解、研究西洋人、俄人,西洋人即使把他们情况向中国人介绍,中国人也不加留意,甚至不予相信。16—17世纪,天主教传教士向中国介绍他们的天文历算知识,也介绍世界地理。“从利玛窦‘进万国图’始,艾儒略、汤若望、南怀仁等,都有所介绍。……‘廷臣多诞之莫信’,士大夫对他们‘亦以西人外之,莫有究其说者’;乾嘉学者对这些西人之书,更‘目笑存之而已’,有人还斥之为‘悠谬者流,张扬彼教,漫作欺人语耳!’”^②

中国的特点之五是:“就社会生存上看,过去中国的文化始终是内陆的农业文化;而西洋文化自其导源便和洋、海结不解的关系。”^②中国很早就拥有海岸线;但中国人从来不求了解海洋,不去征服海洋。中国甚至对近海水面也不加控制。沿海的航运和渔业虽早已有之,但以之与中国海岸线之长、海洋资源之丰富以及和中国庞大人口的需要相对照,是很不相称的。除了秦始皇派人往海外神山去求长生不老药,北魏孝武帝大明三年(459年),僧人慧深等4人乘船东往“扶桑”等极少数记载以外,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尚未有前往为中国人所未知的水域去探险,并占领所发现的地方的冒险活动。中国人从内地发展到沿海,拥有海岸线后,有很长的时间未谋求向海外发展。从中国沿海经南洋群岛到印度洋沿岸的航线并不是中国人首先开辟的。它经希腊人、埃及人、阿拉伯人、印度人航行了许多世纪以后,中国人才加入了这条航线的航运事业。宋、明以来,中国广东、福建两省人开始前往离中国不远并且事先已知有其地的南洋群岛去。中国政府把这些离乡背井、前往蛮荒之地的人看做是“自弃王化”,不但不加鼓励、保护,还要禁止。中国政府对于从事南洋、印度洋航线航

运事业的中国人，也是既不鼓励，也不保护的^②。在西洋人从海上来到中国沿海以前，中国从未遇到过来自海上的强敌。因此，上述中国人对于海的观念，和中国政府的有关政策，两千年来没有改变。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只有战国时代不到 300 年的短期内，沿海的齐、吴、越之间，一度曾有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海上军事力量的对抗。除此以外，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真正的海军。所谓海军，是指由专为在海面上作战而设计的舰只组成，有能力在离海岸较远的深海水面上战斗的舰队。从古罗马到现代，欧洲国家的海军都是由专为在海面上作战而设计的舰只组成，有能力在远离海岸的深海水面，或远离本国港口到敌国沿海去战斗的。至于在内河和在沿海而不能远离海岸的中国水师，以及装载陆军的运兵船队，都不成其为海军。运送陆军的船队，中国早已有之，吴王夫差的船队就是运送陆军的。汉代所谓“楼船将军”不过是在今天湖南、广西一带内河运兵船队的首领。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所装载的陆军，曾登陆作战，但从未进行过海战。郑和的船队没有在海面上作战的能力，所以也不成其为海军。北洋舰队成立以前，中国的水师很难称为一支真正的海军。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中国已有陆战兵法著作问世，书中的一些条规甚至到今天仍然是适用的。然而，中国从来没有海战兵法著作问世。在对付海寇的问题上，明宣德年间（1426—1435 年）的杨溥曾有“鏖战于海岸，不如邀击于海外”的论点。后来归有光也有同样的说法^③。人类的行动和作为，总是被限制在所具备的条件的范围之内的。只有对于那些有可能在海外作战的海军国家说，这个论点才是天经地义的，而对于没有能力在外海作战的国家，这个论点只不过是空洞的空论。一般说来，一个国家虽没有海军，但既产生了这个论点，就有可能从此而从事海军的

建设,然而,中国没有海军而出现了这个论点后,却没有因此而去建设海军。由于没有海军,长期以来,中国水师对付海盗都是采取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俞大猷所说的办法:“海本辽阔,舟行全靠无风海潮,人力不可与抗;且我就所短,而彼用所长,邀击于海中未为良策,故不如设备于陆上。”^②明代平定倭寇是在倭寇登陆以后将其击败或歼灭的。防卫倭寇的“卫所”,除了设在当时属于中国的最大岛屿库页岛上的囊哈儿卫外,其余都设在大陆沿海,近海的无数岛屿都是不设防的,海盗们随时可以加以占领。当时有许多较大的岛屿已经开发,有居民在岛上常住。为了对付海盗,当时的中国政府竟采取放弃海岛、移其民于内地的方法,实行“禁海”,即禁造大船,禁人民出海。这种办法,即使按当时的观点看问题,也并非善策,这是人们根据当时中国人对海洋无能为力的状况,不得已而采取的下策。过去中国政府采取此下策对付海盗、倭寇和那个衰败不振的郑成功后人的反清力量,并未招来大患,但在西洋海上强国来到中国沿海以后,仍然采取此项下策,就要祸患无穷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清水师提督施琅攻克澎湖,台湾郑克塽乞降,清政府中竟出现台湾“应弃应守”的争论。起初,康熙帝既不知台湾岛的大小,也没有考虑到西洋人来到东方所造成的威胁,按照中国不在乎边远土地的旧观念说:“海贼乃疥癣之疾,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③幸而施琅纠正了他的错误:“台湾有地数千里,人民十万,弃之必为外国所据,奸宄之徒窜匿其中,亦未可料,臣以为守之便。”康熙帝始悟到“弃而不守,尤为不可”。^④天津是北京面向海上的门户,雍正帝曾在天津设满洲水师都统1员,兵3000名,守御海口。“然满兵虽雄健,不利水师。初设时,章程草率,所训练技艺不及绿营之半。乾隆丁亥(三十三年,1767年),纯皇帝(即乾隆帝)巡幸津甸,是日大风,海船逆

势,难以施演。时都统为奉义侯英俊,年既衰老,复戎装繁重,所传令俱错误。兵丁技既疏,队伍紊乱,竟操,喧哗不绝。上大怒,因裁革焉。”当时并没有全部裁撤,后来由那个以节俭著称的道光帝于道光元年(1821年)、六年(1826年)先后将该处水师总兵及水师营裁撤。^⑦

由于从未遇到来自海上的强敌,西洋人从海上来到中国沿海,并没有引起中国人的警惕。但康熙帝在晚年曾有所察觉。他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⑧因为他已上了年纪,也因为他预料西洋国家为患将在“千百年后”,所以他未对此有所作为。

中国最后一个朝代清朝,经过两百多年的强盛时期以后,到嘉道年间开始衰落。在乾隆帝统治的年代中,清帝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情况都日趋败坏。大规模的人民起义已在酝酿之中。乾隆五十八年,清廷发觉事态严重,下令大搜捕。但是人民大起义的危机决不是大搜捕所能消除的,何况败坏了的政府的搜捕,往往得到驱使更多的人去参加起义的反效果呢。四川、陕西、湖北三省白莲教“日久党益众,遂谋不靖,倡言劫运将至。……乾隆五十八年事觉,……于是有旨大索。州县吏逐户搜缉。胥役乘虐,武昌府同知常丹葵奉檄荆州宜昌,株连罗织数千人,富家破、贫陷死,无算”。真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清朝政府也采取一些其他措施:十一月间诏永停捐纳。原来“康熙间崇奖清廉,……雍正时,亦勤于察吏。至高宗(即乾隆帝)则总督多用旗人,风气大坏”。^⑨康熙、雍正时府库充盈,到了乾隆年间,财政支绌,臭名昭著的捐纳也兴办起来了。停捐纳固然是一项重要的除弊措施,而整个政权的败坏之势,决不是一二项除弊措施所可挽回的,何况引起人民大起义的,还有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因

素呢。

三省白莲教大起义终于在三年以后(嘉庆元年,1796年)爆发了。清政府派兵镇压。可是清军“交战时以乡勇为先锋,汉人之绿营次之,其素称骁勇绝伦之旗兵在最后。贼军亦驱难民以当锋鏖,真贼在最后观望;乡勇与难民交战,而官兵则与贼军不相值。乡勇伤亡,则匿而不报,或稍得胜利,则冒为己功。然与贼会之时甚稀,惟尾追而不迎击。甚至地方村民,备粮请兵,拒而不纳,常求无贼之地以驻军。军中费用之侈,骇人听闻”^{②9}。入关前后到乾隆前期,八旗官兵骁勇善战的雄姿完全消失了。由于旗兵、绿营失去战斗力,清政府是靠乡勇、团练才镇压了起义的。三省白莲教起义是被镇压下去了,但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问题仍然存在。零星的起义时有发生^{③0}。约50年后,即19世纪50至70年代,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大起义(太平军、捻、回民起义)。太平军之后,由于西方的影响,中国出现了以往朝代灭亡、帝国破裂时期所未曾有过的革命运动。革命运动加速了清朝的灭亡,也加速了帝国破裂趋势的发展,中国又一次进入四分五裂的军阀内战时期。

官吏贪污、军队腐败、灾荒频仍、大小起义不断发生,是朝代衰亡、帝国破裂时期的特征。朝代衰亡、帝国破裂的原因何在?对这一问题的全面探讨不属于本书范围。但作者认为,许多原因之中,有两点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史学界所忽略,因此特提出来作些说明。

一是皇族的退化。自秦统一以来的两千年间,中国史上几个历时较久的朝代有一共同现象,即朝代前期的皇帝,以较有作为的人为多,其中有的是能力很强的政治家。他们大都身心健康。他们多妻,所以多子,皇位总是父子相继的(极少数的例外都有特殊原因)。朝代后期的皇帝则以庸碌无能之人为多,有的是身

心都不健全的低能儿，甚至还有白痴。伴随着皇帝智力上的退化是皇帝生理上的退化。后期皇帝虽然也多妻，却少子女或无子女，他们死后只好由弟弟或侄子或侄孙去承继皇位，因为是整个皇族在退化，所以他们的弟弟或侄子、侄孙也同样无能、无子女。君主专制时代，皇帝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皇帝庸碌无能，国家的政治就不问可知了。就清朝而言，顺治帝死时虚岁 24，已生 9 子。康熙帝有子 35 人，女 20 人。到了咸丰帝，从结婚（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到 30 岁死（咸丰十一年七月）的 13 年间，他的后妃们一共只生了 2 子（其一夭折）1 女。光绪帝和宣统帝是不能生育的人^②。皇族为什么会退化？一个原因是连续多代的近亲结婚，另一个原因是因皇帝的神化，使他们不能和正常人一样成长、生活。中国皇帝从汉武帝开始被神化了^③。以后各朝的开国皇帝因为是在社会上成长的，所以是正常的人，并且是比较能干的人。第二、三代皇帝还能成长为正常的人，多代以后就退化了。皇族的退化是朝代由盛转衰的若干原因之一。

二是人口问题^④。人口增加速度如不加限制，总是超过生产增加速度的。这个问题其实不必专家学者去研究，普通人也看得出来。穷乡僻壤没有文化的老人们，想起他们青少年时村庄的人数，以之和后来的人数相比，就会感叹：人多了，田不够耕种了，生活艰难了。至于中国学术思想界之注意到人口问题的人，从战国时代的韩非子开始，人数并不少^⑤。我们只谈清代。清代到了康熙后期，人口已有显著增加。康熙四十九年（1711 年）十月甲子（初三）诏曰：“体察民生，未尽康阜。良由生齿日繁，地不加益。……自康熙五十年始，普免天下钱粮，三年而遍。”康熙帝的人口论“生齿日繁，地不加益”，简单明了。但康熙年间问题还不严重。过了 80 年后，到了嘉道年间，问题就很严重了。洪亮吉（1746—1809 年）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写成《意言》一书。其中《治